



读史随笔

晓之以理 导之以规 绳之以法

——马服君依法征税的故事

蔡言楚

马服君，即赵国的赵奢。人们都知道他是位有名的军事家，一曰知兵，二曰知人。所谓知兵，即当秦伐赵围困阝的时候，赵王召群臣问计，廉颇、乐乘都说道远险狭，难救。赵奢说：“道远险狭，譬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据说刘伯承同志进军大别山的时候就曾引用这句话激励南下将士）赵王乃令奢将兵救之。结果，大败秦师，解阝与之围而还，赵王封奢为马服君，与蔺相如、廉颇同位。所谓知人，即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少学兵法，以天下莫能当。与奢谈兵，奢不能难。然奢“不谓善”也。括母问其故。回答说：“兵，死地也”。战战兢兢，博谕于众，犹惧有遗虑，而括言易之。必果于自用，忠谋善策无由而入，如果赵以他为将，破赵军者必括也。以后，秦攻赵上党，赵王中秦反间计，撤换了老将廉颇，以赵括为将，结果赵兵四十万除了二百多弱者归还外尽被秦挟诈坑杀之，赵括突围也被秦以箭射杀。毛泽东同志常称纸上谈兵的人就是指的赵括。

然而，很少人知道赵奢原来是个收税的田部吏，而且是位依法办事，执法必严，不畏特权，违法必究的人。平原君是赵王的弟弟，贵戚豪家，但却不肯交纳租税。史载：赵奢依法治之，杀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要杀他。

赵奢说：“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听了这一番从全局出发的大道理，不但没有杀他，反以为他是个人才。言于王，使治国赋。结果“国赋太平，民富而府库实。”前边说他为将是他管财政治国赋以后的事。

看了这个历史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封建和特权是不可分的。在封建社会里，穿什么色的衣服（如新唐书，三品穿紫，五品穿红，六品以下穿绿）漆什么色的门（杜甫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都是严格分等级的。尽管如此，在法律以外的特权还是不允许的。特别是封建阶级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更是如此。不然，赵奢怎么敢杀平原君家用事者九人，包公怎么能铡陈士美呢？社会主义和特权是根本不相容的。叶剑英委员长指出：“国家的法律是人人必须遵守的。一切公民，无论是党内党外、上级下级，无论是什么社会地位和社会成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凡是合法的行为都受法律保护，凡是违法的行为都受法律的追究。”我们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都有依法向国家交纳税收的义务。当我们的税收干部严格依法征税，或者依法课以罚款的时候，作为国营企业的厂长应该怎样对待呢？是知错就改、心悦诚服呢，还是象平原君那样先怒而后服呢，或者怒而不服、伺机报复呢？我看还是第一条为上策，第二条为中策，第三条为下策，那有社会主义的厂长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平原君的呢！

从我们的税收干部来说，依法征税是我们的职责。当然，我们无权象赵奢那样“杀其用事者九人”，杀一个人也无权，但是有权对拖欠税款的课以罚款，甚至有权对偷税、抗税情节严重的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对直接负责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样做是否就够了

呢？还不够。还应当象赵奢那样会做宣传，讲清道理，使人人知法守法。全国财政监察工作会议，上海财政局的同志总结了三句话：“晓之以理”，“导之以规”，“绳之以纪”（或绳之以法）。先说服，后引导，迫不得已最后再绳之以纪或绳之以法。我相信，我们的税收干部比古代的赵奢会做得更好！



巴黎公社与税收

吴才林

无产阶级的政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她的财政税收，有着本质的联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历史上无产阶级税收与巴黎公社的关系。

公社失败，有多种原因，本文只谈她与税收的关系问题。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国巴黎的工人阶级，浴血奋战取得胜利，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型——巴黎公社。

资产阶级出于反动本性，要扼杀这个革命政权，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利用一切手段、包括经济手段，将整个巴黎重重包围起来。

公社为了保卫自己，她的财政委员会，每天早晨必须支出六十七万五千法郎薪饷，供应二十五万人的军费和给养。在革命胜利之初，没收的财产和资金较多，如三月十九日，就掌握了五百八十万法郎。收入大于支出，这对于公

社战士人数激增，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

从公社整个革命期间的财政收支情况来看，支出总额四千六百三十余万法郎；她的收入，除了在敌人国库和银行等获得部分款额以外，查核法国史料，三月二十一日，公社征收了五十万法郎的税款，在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的时间内，仅消费税局就收入一千二百万”^①。在三月份以后，没收的收入不多了，邮政局、消费税局、直接税局、烟草税、注册费、印花税等经常性的税收收入，就是公社维持政权的主要经济来源。

后来，由于公社领导的原因，使得凡尔赛反革命分子有机可乘。无产阶级政权刚刚建立，还没有学会管理经济，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擅长经济管理的技能，在巴黎城内活动猖獗。公社《行动报》主编，普·利沙加勒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凡尔赛的暗中指使下，大部分官员都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市税务局、马路上的照明设备，商店和市场，公共救济机关和电报局。总之，这座拥有一百六十万居民的城市的一切生活设备都必须重新建立。有几个区……钱柜搬走了。兵站留下了六千名病员，医院和诊所里没有一文经费。梯也尔（反动头目）竭力使一切都陷于瘫痪状态，连公墓也不例外”^②，这种大规模破坏的结果，不但引起了社会秩序混乱，而且，迫使财政并不富裕的公社，不得不大量地增加财政的支出。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更加严重的是，敌人利用当时城门开放的机会，诱迫所有稍微有些钱的工商业主，多逃离巴黎。“由于这种卑鄙的潜逃，许多对于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企业停工了”^③，“搅乱了我们城市里的商业”^④。再如邮政局也是当年税收收入的单位，但“三月三十一日，邮政局长拉姆庞……在破坏了整个邮政组织以后逃跑了”，“整个邮政组织处于混乱状态，各分局都已关闭，邮票被隐藏起来或是运走，物资、印章、邮车等都被盗窃走了，金库不存一文”^⑤。正是因为这许多企业的停工和商业、邮政等部门的被严重破坏，使工商企业单位的